

余英時對國民黨的歷史評論

李顯裕

中央警察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副教授

摘要：余英時是當代華人知識分子中，影響最為深遠的學者之一，他的漢學專業學術成就早已名滿全球，但他不是關在學術象牙塔中只作古典漢學研究的學者而已，他同時具有中國傳統士人議政的風格，經常為文關懷當代現實中國、香港與台灣的政治與社會發展。本文試圖考察余英時如何評論，在二十世紀歷史中，影響中國最為深遠的兩個政治勢力之一：國民黨，其在近代中國歷史發展的功過。

關鍵詞：余英時、國民黨、歷史評論

綱目：

- 一、前言
- 二、余英時政治思想的發端與底蘊
- 三、余英時對國民黨的歷史批評
 - (一)、余英時對孫中山及其三民主義的歷史評論
 - (二)、余英時對國民黨的社會基礎與治理之歷史觀察
 - (三)、余英時對蔣介石與蔣經國的歷史評論
- 四、結語

一、前言

當代最具影響力的華人知識分子中央研究院院士余英時先生，他在中國思想史與文化史的專業學術領域，早已蜚聲國際，使得他在 2006 年榮膺有人文諾貝爾獎之稱的「克魯格」獎 (John W. Kluge Prize for the Study of Humanity)，2014 年他再度獲得第一屆唐獎漢學獎。他前承近代中國人文大師錢穆與楊聯陞的學術傳統，並受西方漢學研究風格的影響，融合中西學術傳統為當代中國人文學術發展作出巨大的貢獻，是以使得近代中國人文學界的傳奇人物。同時被認為在二十世紀於中西學知識最淵博的錢鍾書先生，曾稱譽余英時是「中原少有，海外一人」。然余英時雖於漢學界早已是典範性的人物，但他非只限於學術象牙塔中只做古典的漢學研究，他同時具有中國傳統士人議政的風格，經常為文關懷當代現實中國、香港與台灣的政治與社會發展。

而在 20 世紀以來，影響中國最為深遠的是兩個政黨（政治勢力）是為國民黨（包括其前身孫文領導的興中會、同盟會...等）及中國共產黨。筆者在近一、二年多前曾初步為文〈從歷史與政治的層面觀察余英時對中共的批評〉，此處則進一步觀察余英時對國民黨的歷史評論。

二、余英時政治思想的發端與的底蘊

1945 年 8 月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之後，余英時當時正在安徽桐城，他的父親余協中也是歷史學家，學的是西洋史，戰後 1945 年曾去瀋陽創立新的大學—東

北中正大學。1947 年夏天，余英時考取了東北中正大學歷史系，也開始了他的治學道路。但戰後中國始終沒有和平，因為緊接著爆發國共內戰，余英時在 1947 年底讀完大學一年級上學期時，瀋陽已經在共軍的包圍中，於是他們一家乘飛機回到北平，故余英時的大學生涯又中斷了。他們在北平住了十個月，在 1948 年十個月中，余英時的思想發生了極大的波動，這時是中國學生運動最激烈的階段，北平更是領導全國學生運動的中心，在中共地下黨員的策畫下，北大、清華的「左傾」學生發動了一次又一次的「反內戰」、「反飢餓」、「反迫害」的大規模遊行示威。余英時的一位表兄當時即是北大地下黨的領導者，他當時不斷向余英時進行說服工作，希望把他拉入「革命的陣營」，於是余英時的政治、社會意識便逐漸提升了，使得余英時對於中國前途，甚至世界的趨勢不能完全置身事外，並產生了關懷。當時余英時不是在學學生，因此從來沒有參加左派或右派的學生活動，但是當時他的思想是非常活躍的，在左、右兩極間搖擺不定，而且也開始接觸馬克思主義，深入思考有關民主、自由、個人獨立種種問題。

當時余英時在北平期間所常常閱讀的刊物包括《觀察》、《新路》、《獨立時論》等，基本上都是中國自由主義者的議論。惟因為自 1946 年他離開鄉間以後，余英時曾經讀過不少梁啟超、胡適等有關中國哲學史、學術史的著作，也讀了一些五四時期的有關「人的文學」的作品，因此在思想上傾向溫和的西化派，對極端的激進思潮則難以接受，馬克思主義的批判精神雖然是他所能同情的，然而階級鬥爭和余英時早年在鄉村的生活經驗格格不入，他當時是承認社會經濟狀態和每一時代的思想傾向是交互影響的，但是唯物史觀對他當時而言是過於武斷。是以，1948 年在北平的一段思想經歷對余英時以後的學術發展有決定性的影響。他對西方文化和歷史發生深刻的興趣，於是覺得要更深入地了解西方文化和歷史，才能斷定馬克思主義的是非¹。而他最終也沒有為馬克思主義所席卷過去。

後來余英時曾與他在普林斯頓大學任教的同事周質平教授閒聊時提及，他在家鄉安徽潛山官莊鄉，過了九年(1937-1946)農村山居的日子，除了傳統的私塾教育外，家中有一套《胡適文存》和一幅胡適送給他父親的一紙條幅，上面是胡適 1917 年據墨子「影不徙」的哲理所寫的一首小詩，至今余英時還能朗朗上口，幾十年來余英時少年時期所讀過的胡適著作像一粒小種子，成年後生根發芽，為他往後在接觸共產主義的宣傳中，起了相當的「免疫」和「抗暴防腐」的作用。²眾所周知，胡適的思想曾經在中共統治之下，是列為中共的反動文人第一人，甚至全面展開批判胡適思想的運動，在 1951 年底開始，1952 年整整進行了一整年，稍稍冷淡一下之後，在 1954、55 年，以及 1956 年的上半年，又在全國範圍

¹ 這兩段有關余英時早年的自述，參見余英時，〈我走過的路〉，收錄於陳致訪談，《我走過的路—余英時訪談錄》(台北：聯經，2008)，頁 8-10。

² 這首詩為：「飛鳥過江來，投影在江水。鳥逝水長流，此影何嘗徙？風過鏡平湖，湖面生輕皺。湖更鏡平時，畢竟難如舊。為他起一念，十年終不改。有召即重來，若亡而實在」，參見周質平，〈自由主義的新傳—從胡適到余英時〉，《傳記文學》，第 105 卷第 5 期，2014 年 11 月，頁 8-9。

內繼續其清算胡適的運動³，共產黨後來還在中國大陸出版了《胡適思想批判》(共八輯)，足足有數百萬字之多⁴。胡適在 1953 年時對於中共之所以批判他的原因曾說過，因為胡適思想中有反對共產黨的力量，最重要的有兩點：第一胡適提倡自由(思想的自由，信仰的自由，言論的自由)，這是共產黨所無法允許的，所以胡適的自由主義是共產黨認為危險的敵人；第二是胡適提倡懷疑，反對武斷主義，反對教條主義，一切信仰應該經過懷疑，拿出證據，然共產黨要人人做馬列主義的奴隸，只許信仰，而不許懷疑，所以胡適的懷疑主義是共產黨最大的敵人⁵。而余英時受胡適思想啟蒙的影響，使得他早在 1950 年香港新亞書院就讀時，即已在課餘負責編輯《中國學生週報》、《自由陣線》的週刊，及在《人生》半月刊中，主要以筆名「艾群」發表一系列時評和論學的文字，在時事評論的文章中，其主旨是鮮明的反共思想及秉持胡適的自由主義思想與精神。余英時從 1950 年到香港，到 1955 年到美國哈佛大學時，這 5 年時間中大致出版了《到思維之路》(1953)、《民主革命論》(1953)、《文明論衡》(1955)、《民主制度之發展》(1954)、《近代文明的新趨勢》(1953)，及《自由與平等》(1953，此書第一部分原名〈自由與平等之間〉，是討論自由與平等兩個基本概念及其關係的；第二部分是翻譯英國人湯姆遜所寫的一本討論「平等」的書)。這些余英時早年在香港所寫的著作，基本上反映他是走胡適自由主義的信仰，去論斷現實中國、香港與台灣政治與社會的發展⁶。如最具代表性的，他在 1952 年 2 月所發表的〈胡適思想的新意義〉文中特別提及：

胡先生今日反共立場的堅決已十足說明了他的革命熱忱，而他對國民黨反民主反自由作風的厭棄又恰恰是他那「自覺改革論」具體表現。溶革命與改革於一爐而又能隨時隨地運用適當，這正是一位偉大的自由主義大師應有的風格。僅此一點已足使我們敬佩不置了。⁷

這段余英時早年對胡適的評價，特別有意義，其中對胡適所謂「偉大自由主義大師」的讚揚，已允為當時余英時的偶像，⁸尤其是胡適對當時反民主反自

³ 胡適口述，唐德剛譯著，《胡適口述自傳》(台北：遠流，2005)，頁 262。

⁴ 這八輯對胡適思想批判，基本上包括「哲學思想」、「政治思想」、「歷史觀點」、「文學思想」、「哲學史觀點」、「文學史觀點」、「歷史和古典文學的考據」、「紅樓夢研究」等項目，中共對於右派自由主義知識分子如胡適、傅斯年；或文化保守主義的錢穆等諸多學人，都有所批判，然對胡適的批判，可以說是集合全中國力量，對他進行全面性的攻擊，可參看《胡適思想批判：論文彙編》(北京：三聯，1954)，共八輯。對於中共批判胡適的意義之討論，參見胡明，〈胡適批判的歷史理解與文化詮釋〉，收錄於劉青峰編，《胡適與現代中國文化轉型》(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94)，頁 113-137。

⁵ 胡適，〈共產黨為什麼要清算胡適的思想〉，《胡適作品集 25—胡適演講集(二)》(台北：遠流，1986)，頁 101-102。而對於胡適反共思想的討論，可參見周質平，〈胡適的反共思想〉，《現代人物與思潮》(台北：三民，2003)，頁 90-135。

⁶ 余英時在 2006 年時，接受《鳳凰周刊》的訪問時，即自認為是自由主義者，且受西方的自由主義深遠影響，參見余英時著，〈我是一名自由主義者〉，收錄於彭國翔編，《學思答問—余英時訪談集》(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3.1)，頁 111。

⁷ 余英時，〈胡適思想的新意義〉，《自由陣線》，第 8 卷第 11 期，1952 年 2 月，頁 7。

⁸ 1950 年代初期，這時候余英時已投入傳統派的錢穆門下，而錢穆恰恰與西化派是對立的。當時錢穆雖然承認五四新文化運動在學術上有開闢性的貢獻，但完全不能接受胡適、陳獨秀等人對

由的共產黨與國民黨的立場之批評⁹。在這段香港居住的時間，余英時的一些思想正可反映當時他拳拳服膺胡適的思想，如在〈主義與問題〉文中他反對妄自建立思想體系的獨斷方式，尤其是反對「吾道一以貫之」的把一己之所見視為無上的唯一真理，他認為宋明學術(如二程、朱熹、陸象山、王陽明)大致上是義理系統；而清代顧亭林、黃宗羲則成漢學(考據)的開山祖師，文中他同時寫下：

五四以後，學術界上依然是義理與考據兩大壁壘的尖銳對立。義理派的門戶甚多，而以共產主義為其最高的表現；考據派則一方面承著清朝漢學的餘風，另一方面復受了西方實驗主義的影響，依然謹守其不談原則的崗位。胡適之先生因為目睹當時中國學術界上的主義太多，而要我們「多談些問題，少談些主義」。考據與義理是中國傳統的名詞，問題與主義則是近代西方的說法；字雖不同，其實則一。實驗主義猶如散漫的個人主義之敵不過有組織有計劃的極權主義政黨的攻擊一樣，共產主義終於代替了它，而躍登中國思想界的統治寶座，「定於一」的局面又形成了，所不同者「一以貫之」的「道」不再是孔孟程朱的「道」，而是馬恩列斯的「道」而已¹⁰。

此文殊值討論，文中所謂「考據與義理是中國傳統的名詞，問題與主義則是近代西方的說法；字雖不同，其實則一」這樣的對比，不一定適當，姑置不論。惟顯然地，余英時 1950 年代初寫這篇文章時，其背後的思想源頭必然是胡適在 1919 年所寫的著名的文章〈問題與主義〉一文，胡適作為當時中國自由主義主要代表人物，他針對作為中國共產黨創建人之一李大釗(包含藍志先等)的論述，雙方在《每周評論》上針對「問題與主義」進行論辯，當時李大釗抱持著對馬列主義意識形態能解決問題的能力宣稱；而胡適則是則循著自由主義堅持對個別問題要有不同的對待方式，來進行漸進改革的方式，¹¹當然這場論戰後來由馬列主義在中國得勝，¹²而胡適的漸進改革則退出歷史舞台¹³。這裡余英時顯然是贊同胡適的看法，要多研究問題，而少談些主義，是以文中所談「實驗主義猶如散漫

中國傳統的否定態度。而余英時承認最初聽錢穆講課時，在思想上是有隔閡的，因為他畢竟受五四的影響較深，而且他有 9 年傳統鄉村生活的薰陶，是以對傳統文化、儒家思想並無強烈的反感，故也不能接受全盤西化的主張，但是承認中國要走向現代化，吸收西方文化的某些成分是必要的，所以余英時對錢穆的文化觀點是有距離，也有同情，參見余英時，〈我走過的路〉，《我走過的路—余英時訪談錄》，頁 11-12。從以上余英時的自述中可知，他其實因為受五四影響很深，而五四新文化運動最重要的領袖即是胡適，故 1950 年代初期余英時甫到香港時，自然帶有五四的思想啟蒙精神，尤其是對西方民主、自由的理念的信仰。故此時較具有西化精神的余英時必然會感到與文化傳統主義的錢穆有所隔閡，因為余英時的身上正住著一個五四精神的胡適靈魂於其中。

⁹ 胡適批評國民黨的問題之討論，可以參見張忠棟，〈從《努力》到《新月》的政治言論〉、〈在動亂中堅持民主〉和〈為自由中國爭言論自由〉三篇論文，皆收錄於《張忠棟文集》編輯委員會編，《張忠棟文集一：《胡適五論》》(台北：稻鄉，2005)，頁 1-66；153-254；255-288。

¹⁰ 余英時，〈主義與問題〉，《到思維之路》(台北：漢新出版社，1984)，頁 29-32。

¹¹ 胡適，〈問題與主義〉，《胡適作品集 4—問題與主義》(台北：遠流，1986)，頁 113-149。其中包含有藍志先的〈問題與主義〉，和李大釗的〈再論問題與主義〉等相關的論辯文字。

¹² 關於「問題與主義」的論辯所蘊含的意義，參見林毓生，〈「問題與主義」論辯的歷史意義〉，《二十一世紀》，第 8 期，1991 年 12 月，頁 15-20。

¹³ 關於胡適思想終於為馬克思主義所敗而退出歷史舞台的探討，可以參見余英時，《中國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適》(台北：聯經出版公司，2009.4 初版第九刷)，頁 61-75。

的個人主義之敵不過有組織有計劃的極權主義政黨的攻擊一樣」，其中實驗主義當然是指胡適所服膺並引進其師杜威的實驗主義。而胡適在〈問題與主義〉文中曾提出呼籲：

多研究些具體的問題，少談些抽象的主義。一切主義，一切學理，都該研究，但是只可認作一些假設的見解，不可認作天經地義的信條；只可認作參考印證的材料，不可奉為金科玉律的宗教；只可用作啟發心思的工具，切不可用作蒙蔽聰明，停止思想的絕對真理¹⁴。

將胡適〈問題與主義〉與余英時〈主義與問題〉兩篇文章對照來看，大致上可以看出兩人在思想上某種先後呼應，胡適論戰時的李大釗實際上就是中共創黨人之一，當時胡適論戰的具體對象背後，也就是中共所持守的馬克思主義思想信仰，雖然當然中共尚未在中國建立政權；而余英時的〈主義與問題〉也是針對共產黨而立論，從中可知道兩代中國知識分子，都秉持著自由主義的精神，對於「定於一」的共黨政權都是予以批評的。

而在余英時的〈理未易察〉一文中，他特別提及胡適當時在台灣演講，提到「善未易明，理未易察」這句古話，覺得頗富於啟示性，文中認為反共的真理已經散佈在世界一切角落中，問題是我們無法有慧眼去鑑識真理而已。但余英時認為馬克思根據十九世紀的英國狀況研究出來的結論，在當時未嘗不含有相當多的真理成分，但當時的人對馬克思卻沒有什麼反應，等到列寧、史達林之流拾起馬克思的舊話頭時(其中已有許多歪曲之處)，早已牛頭不對馬嘴。然當時千萬萬的青年朋友們沉迷在馬克思主義的「真理」中，正是世間盲目的信仰者何其多的例證。余英時此處舉出當時對反共的真理是「善未易明」，而對馬克思主義之誤為「真理」是「理未易明」¹⁵。余英時幾乎此時亦步亦趨跟著胡適政治思想的流向，其堅定持有「反共」的自由主義的立場，在近代中國自由主義的思想系譜上，幾乎是相同地。

余英時這些少年的著作中，到處充滿著自由主義的思想歸趨，以上只是先示例一二，以概其餘。而這種歸趨顯然是受五四思想啟蒙精神而來的，其中他心目中的典範即是胡適，故在他少年香港時期的時事、政治評論的文字集結成《到思維之路》一書之際，他在此書的序言中，鄭重地說：

最後，請允許我借用胡適之先生的話來表達我內心願望：「從前禪宗和尚曾說：『菩提達摩東來，只要尋一個不受人惑的人。』我這裡千言萬語也只要教一個不受人惑的方法。被孔丘、朱熹牽著鼻子走，固然不算高明；被馬克思、列寧、斯大林牽著鼻子走也算不得好漢，我自己決不想牽著誰的鼻子走，我只希望盡我的微薄的能力，教我的少年們學一點防身的本領，努力作一個不受人惑的人！」¹⁶

¹⁴胡適，〈問題與主義〉，《胡適作品集 4—問題與主義》，頁 142-143。

¹⁵余英時，〈理未易察〉，《到思維之路》，頁 37-38。

¹⁶余英時，《到思維之路》，書中的〈自序〉，頁 4。

這段話寫於 1953 年 10 月 23 日，此時余英時方才 23 歲，但也充分預告了往後六十年的時間，他以胡適自由主義的精神為圭臬¹⁷，作為他政治理念的歸宿，並以之對中國共產黨和中國國民黨提出針貶之言，余英時多年的治學生涯中，先後多次撰寫了胡適的相關研究，其中有關涉學術研究的層面，如《中國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適》長文、〈《中國哲學史大綱》與史學革命〉；亦有廣泛觸及胡適一生事蹟的論述和政治影響，如〈從《日記》看胡適的一生〉、〈胡適與中國的民主運動〉¹⁸；亦有為相關胡適研究的著作寫的序言文章，¹⁹余英時認為胡適是 20 世紀在中國影響力最大也最長久的思想家²⁰，他在學術上自然與胡適頗有距離²¹，然在自由主義的信仰上，他完全是受胡適啟蒙而建立他的思想方向。而另一方面余英時此序文中對於以馬克思、列寧、斯大林為師的中共政權，其所違背自由的原則並具有的集權本質，他從不間斷地有所批評，是以儘管在文化上，余英時是認同中國文化的，並具有「中國情懷」²²，但在政治上他從不認為中共可以代表中國，故堅持在共產極權統治下的中國未改變其本質之前，決不回到中國。而胡適雖然在二十世紀中國兩極化的政治思潮（左派的共產黨和右派的國民黨）的歷史氛圍之下，只能選擇站在國民黨一邊去反對共產黨，但是終其一生，胡適並不放鬆當國民黨違反自由主義原則之作為的批評，對此余英時同胡適政治思想的精神，故余英時對國民黨的歷史評論亦是如此。其實余英時對待國民黨的態度，亦可從他的師承和親屬關係略作分梳。

從余英時的師承上來看，錢穆在政治思想上基本上是偏向國民黨，而批判中國共產黨、馬克思主義的²³，故他稱讚孫中山與蔣介石²⁴，而楊聯陞終其一生可謂是純粹學院式的人物，對於實際政治不但沒有興趣，而且視為畏途，楊聯陞

¹⁷ 1950、60 年代當時台灣的《自由中國》雜誌，是由胡適和國民黨的自由派人士如王世杰、杭立武、雷震等人所籌辦的。它基本上宣揚民主自由的理念，余英時曾說他當時是每期必讀的，且受其啟發，逐漸對自由主義能摸索到一點門徑，參見余英時，〈《民主評論》新儒家的精神取向—從牟宗三的「現世關懷」談起〉，收錄於彭國翔，〈智者的現世關懷—牟宗三的政治與社會思想〉（台北：聯經出版公司，2016）一書中的〈序〉，頁 15、16-17。

¹⁸ 以上諸文皆收錄在余英時，《重尋胡適歷程（增訂本）》（台北：聯經出版公司，2014.8）一書中。

¹⁹ 余英時，〈胡適在今天的中國—序《胡適與近代中國》〉，收錄於周策縱等著，《胡適與近代中國》（台北：時報，1991），頁 5-7；余英時，〈李建軍《學術與政治—胡適的心路歷程》序〉，收錄於余英時著，彭國翔編，《會友集（上）》（台北：三民，2010 增訂版一刷），頁 206-209。

²⁰ 余英時，〈胡適是 20 世紀影響力最大也最長久的思想家〉，收錄於彭國翔編，《學思答問—余英時訪談集》，頁 183。

²¹ 在史學研究上，胡適基本上是一位較接近乾嘉考證型的學者。而余英時受其師錢穆、楊聯陞之影響，一方面於乾嘉考證學的根柢至為深厚；但一方面，錢穆的史學通識風格和陳寅恪兼攬漢學與宋學之長，都呈現在余英時的學術風格上。

²² 余英時，〈「常僑居是山，不忍見耳！」—談我的「中國情懷」〉，《文化評論與中國情懷》（台北：允晨，2010.08 增訂一版），頁 371-377。

²³ 實際上錢穆雖以國學及中國歷史的研究著稱，但是他對時代思潮共產主義與馬克思主義仍有一定的理解高度，此可參見錢穆，《從中國歷史來看中國民族性及中國文化》（台北：聯經出版公司，1991 第十一次印行），頁 124-128。其中錢穆曾說：「中國共產黨則憑藉政治專制來改造社會經濟，這種改造必然仍是破壞性，而非建設性，這是一無辦法」，參見錢穆此書，頁 125-126。

²⁴ 錢穆在政治思想上傾向國民黨及孫文、蔣介石的相關言論，可參見錢穆，〈治統與道統一從中國文化看國父與故總統孫蔣二公及當前之學術界〉，《中國學術思想史論叢（九）》（台北：蘭臺出版社，2000），頁 49-58。

曾經告訴余英時，在三十年代中期，楊曾經當選為北平大學生聯合會的主席，那正是學生運動左右分化最為尖銳的時代。他這主席一直處於左右兩派學生的夾攻之中，吃盡了苦頭，從此以後便遠離了一切政治活動了²⁵。據此可知，余英時的政治思想意識之深淺與錢穆接近，而遠於楊聯陞。而在政治思想的取向上仍與錢穆有相當的差異，這點後面再詳論。

而另一較少人提及的是余英時的岳父陳雪屏可能對余英時的政治傾向的影響。陳雪屏向來與國民黨的關係密切，曾進入國民黨的權力核心，1949 年赴台之後，先後任台灣省政府委員兼教育廳長，隨後擔任國民黨中央改造委員會委員兼普通黨務組組長。1952 年兼任「中國青年反共救國團」團務指導委員。1953 年任正中書局董事長。國民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召開時，陳雪屏當選為中央委員，並被推舉為中央常務委員。此後歷任各種職務，1973 年之後由於年事已高，主要擔任「總統府」國策顧問，1990 年任「總統府」資政²⁶。目前的文獻很少看到余英時對其岳父陳雪屏的討論，但是翁婿關係這或許也可能隱含著影響余英時的政治意識。不過綜而言之，對於余英時政治思想最重要的啟蒙者當是胡適，余英時一生生命中的某些身影，顯然都可以看到胡適精神的重現。故余英時誠然對中共批評至為嚴峻，但他也秉持胡適自由主義的人文精神去評論國民黨的歷史功過。

三、余英時對國民黨的歷史批評

（一）余英時對孫中山及其三民主義的歷史評論

我們首先考察余英時如何看待孫文的革命運動及其思想學說。余英時以為滿清在清末並無轟轟烈烈的「新政」，戊戌變法之後，慈禧和滿州保守派貴族最怕滿州政權被漢人奪走，並不敢真正讓漢人士大夫進行認真的改革。而滿清的改革基本上是行政改革而不是政治改革，庚子之變之後的改革，都是行政方面的調整，因為政治改革是要涉及整個體制的，然晚清的「預備立憲」之所以尚須等待 9 年，主要是因為慈禧太后至死都不肯放棄權力，不肯改變「君主專制」體制。故統治中國的滿州則是一個「滿州黨」，這個黨絕對不能放棄權力，故所謂「清末新政」，只是清王朝做了一些行政的調整來緩和危機而已。危機緩和不了，於是才有辛亥革命。而孫文領導的革命建立民國，事實上民國轉換並沒有經過一個很嚴重的革命暴力，社會成本也很低。而其結果也不壞。因為早期的議會是相當認真的，很有效力。所以導致宋教仁被袁世凱暗殺了²⁷。故對於孫文在晚清的革命運動，余英時基本上是肯定的，且對於孫文的學說三民主義亦多所肯定。

²⁵ 余英時，〈《論學談詩二十年：胡適楊聯陞往來書札》序〉，收錄於余英時著，彭國翔編，《會友集（上）》（台北：三民，2010），頁 114。

²⁶ 周言，〈余英時的岳父陳雪屏〉，《蘋果日報副刊》，2013 年 10 月 27 日。

²⁷ 余英時，〈回首辛亥革命〉，收錄於余英時等著，《不確定的遺產》（北京：九州出版社，2015.5），頁 47-49。

因為相對於中共的意識形態主要來自於西方舶來品馬克思主義，而國民黨最重要的政治思想是孫文的三民主義。基本上孫文的思想學說則源自於融合中西的思想傳統與學說²⁸。尤其孫文學說與中國傳統文化更是緊密相關，余英時有一長文深刻分析此一問題，他指出孫文學說大致上受到 19 世紀中國的經世學派影響，如康有為的《大同書》中對《禮記·禮運》中「大同」說的詮釋，其影響著孫文「天下為公」的思想，孫文對於早期中國文化的理解反映了康有為影響的痕跡，惟孫雖受康之影響，但他不會盲從於任何思想，不管是東方的還是西方的，由於康有為是 19 世紀最後十年中國思想界的主要人物，而孫文此時思想正趨於成熟時期，故自然會對康有為今文經學派為己所用的儒家經典新詮釋有所欣賞，而孫文在面對現代化而尋求理解自己的文化傳統時，康有為的思想不是唯一影響他的理論，當孫文革命理論逐漸形成時，他仍以各種方式來修改自己對中國傳統的看法，其他的學者如馮桂芬等也影響著孫文，這終使得孫文超越了康有為的今文經學的最初影響。

如孫文 1894 年著名的〈上李鴻章書〉提及的歐洲富強之本不盡在「船堅炮利，壘固兵強」而在於「人能盡其才，地能盡其力，物能盡其用，貨能暢其流」的思想，這些反映了晚清當時經世學者們的普遍模式，如張之洞區分了包括「船堅炮利」在內的「西方技術」和包括學校制度、經濟組織、工商發展在內的「西方制度」，並認為西方制度比西方技術遠為重要，而實際上這正是孫文上書的主要意思。而馮桂芬的《校邠廬抗議》在晚清主張改革的菁英圈是很有影響的，此書中曾言：「以今論之，約有數端：人無棄材不如夷，地無遺利不如夷，君民不隔不如夷，名實必符不如夷。」，這些思想與孫文後來的許多觀念是相同的，而《校邠廬抗議》一書在晚清有諸多版本且頗為流行，故孫文的思想當是受到馮桂芬《校邠廬抗議》一書的影響。而余英時更追索了孫文的三民主義與中國傳統的關聯。如民族主義可追溯到王夫之的「文化認同源自血統種族」的觀點；民權主義源自於〈禮運〉大道之行，天下為公觀念，以及孟子的「民為貴，君為輕」的思想；民生主義背後則有儒家「均」的觀念，如孔子所謂「不患寡而患不均」之思想，是以孫文讚美井田制度是古代中國最好的制度。故總體而論，余英時認為孫文的思想學說，從表面上看來，他的理論是一個大雜燴，或說得好聽一些是西方各種理論的一個綜合，但是進一步探索孫文思想的深層結構，實際上在層層表面之下的是中國的傳統因素²⁹。對此顯然余英時對於擘建國民黨的領導人物孫文，以及孫文思想學說中源於中國傳統的部分是頗為肯定的，且這些中國傳統思想都有其歷史意義與價值，此與中共以馬克思主義為師，且吸收中國傳統專制王權的

²⁸ 余英時稱在二十世紀的中國政治家中，我們只能承認孫文一人對於「王道」的現代意義有真切的理解，他在答覆一個俄國革命家的問題時曾說「中國有一個正統的道德思想，自堯、舜、禹、湯、文、武、周公至孔子而絕，我的思想就是繼承這一個正統的道德思想，來發揚光大」，余英時認為孫文所說的「正統的道德思想」，自然只能指「王道」（純任教德）的理想而言，參見余英時，〈「王道」在今天的世界〉，收錄於馬鶴凌編著，《文明融合與世界大同論證文集》（台北：台灣中華書局，2000），頁 140。

²⁹ 余英時，〈孫逸仙的學說與中國傳統文化〉，收錄在余英時著，程嫩生、羅群等譯，《人文與理性的中國》（台北：聯經出版公司，2008），頁 387-416。

糟粕顯然是迥異的。余英時並進一步分析三民主義的思想開放性與其與時俱進的部分。

余英時為文指出，國民黨奉為指導思想的三民主義最早是由孫文在 1905 年《民報·發刊詞》中正式提出的，1905 年孫文剛開始提出的三民主義對一般革命黨人而言是：民族主義的意義僅限於排滿；民權主義則是打擊君主政體的，特別是康有為、梁啟超所提倡的君主立憲；民生主義幾乎完全落了空，甚至「平均地權」也得不到黨人的贊同。當時了解孫文的三民主義學說的人實在很少。而到了 1924 年時，當孫文演講三民主義時，其基本精神雖先後一貫，但具體的對象已完全改變，此時孫文三民主義的講詞，可以發現孫文的民族主義已轉為向帝國主義爭取民族的獨立自主；民權主義也不限於政治形式，而是要造成一個政權在民的現代統一國家，其直接目標自然是要掃清軍閥的割據；民生主義此時已從「平均地權」擴大到「節制資本」，³⁰余英時認為這裡可以看出三民主義的內涵隨著時代的轉變而有所調整，故有其開放性的一面。然三民主義後來經常引起諸多爭辯的是孫文曾在《民生主義》第一講中曾有「民生主義就是社會主義，又名共產主義，即是大同主義」一句話，這對照著諸多爭辯孫文晚年是否已經左傾而接近共產主義的疑惑，尤其他過世前所寫的〈致蘇聯遺書〉³¹，和他的遺孀宋慶齡傾向中國共產黨的歷史事實，更使得孫文與共產主義的問題令人迷惑。對此余英時則提出一個歷史解釋，他舉出孫文的民生主義決不是馬克思的社會主義或共產主義，這在《民生主義》第一講中已有明白的交代。孫文說西方的社會主義有五十七種，又說馬克思是「社會病理學家」而非「社會生理學家」。歸結孫文何以會說「民生主義就是社會主義，又名共產主義」，余英時說這有其歷史背景：第一是當時（民生主義講演是在 1924 年 8 月）孫文正採取「聯俄容共」以改組國民黨的新政策，他說民生主義即是社

³⁰ 余英時，〈中國國民黨與思想現代化〉，《文化評論與中國情懷（增訂一版）》（台北：允晨文化公司，2011.8），頁 183-184；余英時，〈三民主義與中國統一〉，《民主與兩岸動向》（台北：三民書局，1993），頁 178。

³¹ 孫文，〈致蘇聯遺書〉，收錄於蔡尚思主編，《中國現代思想史資料簡編（第二冊）》（浙江：浙江人民出版社，1986 第二次印刷），頁 516-517。在台灣歷史教育的課本中，基本上是無法看到孫文 1925 年 3 月 11 日所寫的這篇遺書，因為它畢竟涉及中華民國國父孫文思想是否左傾的歷史問題，然而面對歷史的真實才能了解歷史的曲折面貌，進而能對諸多的歷史發展才能有更真切的理解。此篇〈致蘇聯遺書〉全文如下：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大聯合中央執行委員會親愛的同志：我在此身患不治之症。我的心念此時轉向於你們，轉向於我黨及我國的將來。你們是自由的共和國大聯合之首領。此自由的共和國大聯合，是不朽的列寧遺與被壓迫民族的世界之真遺產。帝國主義下的難民，將藉此以保衛其自由，從以古代奴役戰爭偏私為基礎之國際制度中謀解放。我遺下的是國民黨。我希望國民黨在完成其由帝國主義制度解放中國及其他被侵略國之歷史的工作中，與你們合力共作。命運使我必須放下我未竟之業，移交與彼謹守國民黨主義與教訓而組織我真正同志之人。故我已囑咐國民黨進行民族革命運動之工作，俾中國可免帝國主義加諸中國的半殖民地狀況之羈縛。為達到此項目的起見，我已命國民黨長此繼續與你們提攜。我深信，你們政府亦必繼續前此予我國之援助。親愛的同志，當此與你們訣別之際，我願表示我熱烈的希望，希望不久即將破曉，斯時蘇聯以良友及盟國而欣迎強盛獨立之中國，兩國在爭世界被壓迫民族自由之大戰中，攜手並進以取得勝利。謹以兄弟之誼，祝你們平安！孫逸仙（簽名）

會主義或共產主義，顯然是政治策略的一種運用；第二更重要的是，孫文這種說法正是要使當時的中國共產黨失去存在的理論根據。孫文深信他的民生主義足以消融共產主義於無形，故孫文關於民生主義的新詮釋是針對著中國共產黨而發的。是以 1924 年國民黨的改組無論是在國民黨黨史或在中國現代史上都是極具重要的歷史里程碑，而孫文 1924 年這一新的「三民主義」講詞（與 1905 年的三民主義做比較）講詞則代表這一特定的歷史形勢下國民黨在思想方面的新發展³²。

對此孫文晚年是否左傾的問題，筆者以為余英時的解釋足資參考，然當時世界局勢正處於 1918 年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的歷史氛圍，此時民族自決主張方熾，而蘇聯共產革命確實激動了當時諸多的知識分子和政治人物，且當時英美法西方強權並沒有為中國在巴黎和會中發聲，此遭到諸多中國知識分子的批評，惟獨蘇聯願意支持孫文的政治勢力，諸多因素恐怕使得晚年孫文處於思想的拉扯，而落實到現實中國的歷史事實則是孫文所倡導的「聯俄容共」政策。

余英時是否能周全的解釋孫文是否左傾的問題，或許學界還有諸多的討論，畢竟這是一複雜的歷史問題。然大致上余英時以為三民主義雖然也是一種政治意識形態，但是它與共產主義性質迥異。他認為三民主義是開放性的現代立國原則，共產主義則是封閉性的政治教條。孫文最初提出三民主義時，是斟酌當時西方思潮和中國文化傳統而獲得的一種綜合判斷，他自始便沒有把三民主義看作是個人創見而強加於國人。三民主義只為中國指出了現代化的基本方向，但並不是限制中國人向前展的一條僵硬教條，從孫文對於三民主義的先後不同理解，就足以說明三民主義與時俱新的開放性格。亦即是三民主義在本質上具有自我調整的機能，與馬列主義的封閉性形成強烈的對比³³。

余英時同時認為 1924 年改組之後的國民黨儘管在形式上接近蘇俄模式，但孫文的本意則顯然是以此種形式為革命的過渡時期，孫文最後目的仍然要回到民主憲政的常軌之內，故他才有軍政、訓政、憲政三階段的劃分。而歷史的發展是，北伐成功後，軍政很快過渡到訓政階段。惟在訓政階段，正逢中國內憂外患交迫之時期，當時訓政階段，實際上中國只是形式上的統一，各地方的軍閥力量很多都不是南京國民黨政府所能控制，同時中國共產黨勢力不斷的挑戰，尤其是日本對中國極為強大的威脅侵略，導致國民黨在訓政時期的思想工作與過渡到憲政的工作完全繳了白卷。在訓政階段國民黨極力宣傳「一個黨、一個努力」之說，且效法蘇聯也想走「統一思想」的路，在「革命」兩字的掩護之下嚴格限制學術界、教育界的思想自由和言論自由，甚至如胡適所代表的自由主義也為國民黨所不容，這是國民黨在中國思想現代化過程中的一大逆轉³⁴。余英時更舉出在抗日戰爭期間國民黨正式全面推行「黨化教育」，此則成為知識分子與國民黨決裂的關鍵所在。如 1947 年蕭公權應聘到南京中央政治

³²余英時，〈中國國民黨與思想現代化〉，《文化評論與中國情懷（增訂一版）》，頁 185。

³³余英時，〈三民主義與中國統一〉，《民主與兩岸動向》，頁 177-178。

³⁴余英時，〈中國國民黨與思想現代化〉，《文化評論與中國情懷（增訂一版）》，頁 190-191。

學校任教，在就任後，教育長竟約同黨方人員對蕭進行一場關於「國父遺教」的考試。此正可說明國民黨對高級知識分子的輕侮的荒謬至極³⁵。

然而國民黨儘管在訓政時期，因著內憂外患的關係，走進蘇聯列寧式「一黨專政」集權主義的政黨模式，但是余英時認為國民黨根本不具備「一黨專政」的社會條件，國民黨執政後完全沒有觸動既存的社會結構，士、農、工、商各社會階層都在原來的軌道進行自我調整，以求適應現代的變化。因此國民黨的控制僅及於政治表層，而不能深入社會。歸根究柢，國民黨的「一黨專政」的理論是不徹底的，它只能以「訓政」為藉口，但「訓政」時期不可能太久，因為根據孫文的學說理論，它終歸要到「憲政」階段。是以當國民黨在口頭上不能不尊重憲法、人權、自由等現代價值，惟在實踐上卻背道而馳實行「一黨專政」，此在抗戰初期因民族危機而仍然能得到社會各界、各階層的支持。但它的「專政」、「黨化教育」（1939年所推行的）並不能處處得心應手，例如西南聯大雖設有區黨部、訓導處，並要求院長以上的人必須入黨，但事實上聯大的自由主義傳統，毫無實質的改變。故丁文江說「國民黨的專政是假的」³⁶，這句話指出國民黨的一個重大弱點，即在於它並無專制的社會基礎而偏偏要想壟斷全國的政治權力，因此失去了中產階級和許多知識分子的同情³⁷。

余英時對國民黨的批評確有所見，如國民黨在1947年進入憲政階段，雖然因為國共內戰關係，憲政之實施隨即中斷，但它仍必須遵守孫文軍政、訓政、憲政三階段的政治規劃，也必須標舉孫文學說中的民權主義的主張，故1949年來到台灣之後，儘管在戒嚴時期，國民黨為了宣傳作用仍去支持胡適、雷震等人主持的《自由中國》雜誌的發行出版，而後來在1970、80年代之後也漸漸的開放了政權，回到孫文的民權主義的主張。

（二）余英時對國民黨的社會基礎與治理之歷史觀察

對於國民黨政權的社會基礎，余英時指出孫文在本質上還算是一個知識份子，而國民黨黨內最初也容納不少知識分子。但從北伐成功之後，國民黨實行一黨專政，它便越來越和知識分子疏離了。北伐以後，社會上有「黨棍子」的新名詞流行。這個名詞在無意中說明了國民黨的基層幹部或是出身「光棍」或者已「光棍化」。北伐前後國民黨和胡適以及其他自由主義知識份子的關係則由友好變為敵對。而孫中山本人對胡適是相當尊重的，他寫成《知難行易學說》後，還特別要廖仲愷寫信請胡適從學術觀點予以評介。廖仲愷、胡漢民等人和胡適在《建設》雜誌上辯論古代井田制度的問題，雙方的態度都是嚴肅而理性的。但是北伐成功以後，雙方的關係迅速地惡化。在《胡適的日記》中，我們可以看到胡適在發表了〈知難、行亦不易〉一文之後，國民黨方面的反應是多麼強烈！但是最具代表性的則是胡適的真正對手，還不是作了立法院長的胡漢民，而是一個名

³⁵余英時，〈中國知識分子的邊緣化〉，《中國文化與現代變遷》（台北：三民書局，1995再版），頁41。

³⁶余英時，〈費正清與中國〉，《中國文化與現代變遷》，頁154-155。

³⁷余英時，〈日本的侵略改變了中國的命運〉，《中國時報》，1995年7月5日，第4版。

叫陳德徵的人。這個人當時是上海市黨部中的重要角色，他連中學也沒有畢業，寫的罵人文字充滿了流氣，正是一個典型的都市流氓。余英時接著舉出國民黨在奪取政權過程中，它的中下層幹部已大量的流氓地痞化。國民黨上層中雖不乏知識份子出身的人，如胡漢民、吳稚暉之流，但是在中下層「黨棍子」層層包圍之中，也不免自我異化了。後來在抗日戰爭期間國民黨正式全面推行「黨化教育」，尤其是知識份子和國民黨決裂的關鍵所在。但是國民黨畢竟是一個不徹底的邊緣人集團，它沒有摧毀中國原有的一切民間社會組織的企圖，而且也無此能力，此與中國共產黨全面掌握與破壞中國民間社會極為不同。知識份子即使拒絕國民黨的「黨化」，還是能在困難中覓取生存的空間。而且國民黨雖然嚮往極權式的黨組織，但它的基本理論依照孫文學說的規定，它最後必須由「訓政」回歸「憲政」。故它因此不可能完全無視於社會的壓力，包括來自知識份子的壓力³⁸。

從這邊我們可以看出國民黨的社會基礎在北伐以後，實行「一黨專政」時期，有結構上的改變，社會邊緣人的集團使得國民黨的統治本質漸漸趨於專制化，惟也因為國民黨的立黨的思想基礎孫文學說，其中所存有的對自由民主的人權追求，終使得國民黨必須回歸到孫文所設計的憲政建國規劃，而與中共的歷史軌軌有所差異。

對於國民黨治理的歷史功過，余英時曾提出為什麼中國政治會從北洋軍閥統治演變為國民黨的黨國體制。他以為這牽涉到國際形勢，尤其是日本的侵略是最大的關鍵。日本在 1920、30 年代完全控制在中下級的軍國主義者的軍官手中，自信可以稱霸亞洲，故以中國為其併吞的目標所在。在日本侵略之下，客觀的情勢逼使中國在危急存之際，需要靠強有力的政黨凝聚力量，一致對外，所以國民黨在抗戰時期的口號是「一個主義，一個政黨，一個領袖」，於是造成大家都要擁護國民黨，終培養出一個黨國體制³⁹。這是國民黨形成黨國體制的歷史原因，然而在這一黨國體制、一黨專政之下，國民黨的治理功過為何呢？

余英時指出當今中外史學家的深入研究，大致上已經得到一個大家共同接受的看法，即從北伐統一到「七七」（1928-37）這十年之間，中國不但有建國的機會，而且也取得若干現代化成績。國民政府奠都南京之後，中央與地方各層行政組織都在逐漸演進，至少提供一個可以運作的現代架構。雖然國民黨自 1924 年採用了蘇聯「一黨專政」的模式，對現代行政系統造成嚴重的干擾，更引起知識分子的嚴重不滿，但自 1931 年後的「九一八」之後，南京的國府也表現一定程度尊重專家的意向，因此吸收不少學術界的人才（人文社會學科與自然科學），參加建設的工作。如國防建設委員會（後來發展為資源委員會），胡適就對此至為滿意。又 1930 年之後，高等教育突飛猛進尤其是當時的一件大事，北方的北大、清華、南開，南方的交大、中央大學、武漢大學、中山大學、浙江大學等都各有重要的學術貢獻。後來世界知名的中國科學家和人文學家、社會科學家中，很多都是出身於這些國立大學的師生。而從社會變遷上看，中國中產階級的逐漸

³⁸ 余英時，〈中國知識分子的邊緣化〉，《中國文化與現代變遷》，頁 40-41。

³⁹ 余英時，〈回首辛亥革命〉，收錄於余英時等著，《不確定的遺產》，頁 52-53。

成長和傳統民間社會向現代公民社會的過渡的趨勢不變，因為自清末以來，大城市已開始有現代工商業的組織，報紙雜誌輿論力量的漸漸強大，現代型知識分子團體更是活躍，這些新的社會力量崛起於北伐之前，但在國民黨的南京時代仍然繼續成長，然而這些 1930 年代中國走向現代化百年難見的契機，卻因為日本 1937 年的盧溝橋事件，逼得中國走向八年抗戰之路，以致剛剛開始的一點現代化建設，包括政府和民間的，全部毀於戰火⁴⁰。對此余英時雖然批評了國民黨在訓政時期的「一黨專政」之弊，但他也客觀指出造成這一政治現象背後的歷史環境與時代氛圍，且國民黨的專政治理，在某些層面也有其現代化建設的成績，它終歸須在孫文的思想學說之指導，以及現代公民社會的壓力之下，必須轉型到民主憲政的體制，證之歷史的發展，1947 年國民黨在中國實行民主憲政（雖然這一憲政的發展，隨後因為國共內戰之歷史劇變而致中止），1980 年代中期國民黨在台灣逐漸解除戒嚴並開放政權，都可以看出國民黨與中國共產黨在本質上的巨大不同。

⁴⁰余英時，〈日本的侵略改變了中國的命運〉，《中國時報》，1995 年 7 月 5 日，第 2、4 版。

（三）余英時對蔣介石與蔣經國的歷史評論

在國民黨的歷史發展中，繼孫文之後，蔣介石與蔣經國是兩個主要領導人，余英時如何評價蔣介石與蔣經國，這也是值得觀察的地方。

當 1975 年 4 月 5 日蔣介石過世時，余英時稍後在 5 月 1 日發表〈中國現代的民族主義和知識份子—敬悼蔣總統過世〉一文在《聯合報》上，余英時基本上肯定蔣介石在中國近代史上最卓越的貢獻，是在他一生不屈不撓的堅持孫文的民族主義的建國原則。從 1927 年的北伐成功到 1945 年的抗戰勝利，中國在蔣介石的領導下，終於從帝國主義不平等條約的束縛中解放出來。1943 年 1 月 11 日，中、美和中、英平等新條約簽字之後，這是蔣介石總統堅苦卓絕的領導所成就的歷史功勳。基本上余英時認為蔣介石是一位民族主義者和愛國者，他的一生最重要的成就亦是在這層面上。同時余英時也認為在近代中國的政治領袖中，只有蔣介石和孫文是尊重知識分子的，而蔣介石容忍反對言論的尺度是很寬闊的⁴¹。這篇文章當然有其時代的背景，在現有已出版的余英時專書中，從沒有被收錄進余英時的文集、專著中⁴²，或許余英時不一定是那麼滿意文中的諸多的論點，尤其是蔣介石對待知識分子是否是二十世紀最寬容的政治人物。

實際上余英時早在 1967 年，台大要解聘殷海光時，當時著名的美國哈佛大學費正清（John King Fairbank）教授就找過余英時到他家中，商量怎樣由哈佛燕京學社出面給殷海光一筆研究費，邀請殷海光來訪問。而余英時的任務是根據殷海光的著作向哈佛燕京學社陳詞，當時余英時即已向費正清表示國民黨恐怕不可能讓殷海光出境⁴³。是以余英時對於當時國民黨如何對待知識分子如殷海光或者對《自由中國》雜誌社的攻擊圍剿應當是了解的⁴⁴。

其實余英時曾指出知識分子是推動中國近代、現代史發展的一股主要力量，但等到政治人物的權力漸漸掌握到之後，知識分子就被邊緣化了⁴⁵，最終

⁴¹ 余英時，〈中國現代的民族主義和知識份子—敬悼蔣總統過世〉，《聯合報副刊》，1975 年 5 月 1 日，第 12 版。

⁴² 余英時此文只有收錄於周陽山、楊肅獻編，李國祁等著，《近代中國思想人物論—民族主義》（台北：時報出版公司，1980 初版；1985 初版四刷），頁 557-568。

⁴³ 余英時，〈費正清與中國〉，《中國文化與現代變遷》，頁 153-154。

⁴⁴ 余英時曾說過 1950、60 年代的《民主評論》和《自由中國》都對他有影響，他在兩個刊物上都有寫過文章，如最早的一篇〈論平等〉刊載在《自由中國》上，余與雷震雖未見過面，但是通過好幾次信。後來余英時與殷海光在思想上相差很遠，余寫的〈論平等與自由之間〉，殷海光不肯刊登，雷震還寫信跟余抱歉。因為余英時那時就提出，講自由、平等這些東西，不能脫離中國文化來講。在文化脈絡中怎麼實現平等、實現自由，你不可能照搬西方古典的自由主義，參見何俊，〈師英錄—余英時先生受學記〉，收錄於何俊編著，《師英錄》（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14.8），頁 9。實際上余英時思想與西化派的殷海光頗有差異，但是余仍然尊重殷海光知識份子的勇氣去力抗當道，而爭取民主、自由、人權，故當時余英時即協助費正清和哈佛燕京學社撥款幫忙處於困境中的殷海光，殷海光雖然還是未能成行美國，但仍由哈燕社將研究費按期匯給他，使他可以繼續留在台大，參見余英時，〈費正清與中國〉，《中國文化與現代變遷》，頁 153-154。這也反映了余英時自由主義的人文精神。

⁴⁵ 余英時，〈中國知識分子的邊緣化〉，《中國文化與現代變遷》，頁 33-50。

掌握政權的都是一些光棍，如中國史上幾個有名的「開國之主」如劉邦、劉秀、李世民、趙匡胤兄弟，以及朱元璋都合乎「世路上英雄」或「光棍」的條件，孫文是知識分子所以抓不住政權，只好讓位給「光棍」袁世凱。到國民黨北伐成功，表面上統一了中國，也因為蔣介石是一個「世路上英雄」或「光棍」，國民黨元老中的知識份子如胡漢民、汪精衛也只好靠邊站了⁴⁶。余英時此處視蔣介石為「世路上英雄」或「光棍」，自然令人頗為玩味。

而蔣介石如何對待知識分子，余英時自然深知蔣介石在台灣極為禮遇他的老師錢穆，並蓋了素書樓給錢穆居住。而余英時也舉出蔣介石與胡適的一個例子。1958 年胡適就任中研院院長之位，蔣來致辭，恭維胡適因為崇高道德以致在大陸上受到批判。而胡適答詞，開頭使用了「總統錯了」四字，並解釋他受到批判是由於提倡科學方法所致。胡適的「總統錯了」四字等於打了蔣介石一個耳光，使蔣下不了台。蔣極為憤怒，卻不便當眾發作。但從此以後蔣介石再也沒有進過中研院的大門。余英時認為此事也可見蔣介石有相當修養，至少還有尊重知識領袖的雅量⁴⁷。

其實余英時成長的環境正處於中國內憂外患之際，而時代的氛圍正是民族主義的思潮抬頭，余英時不免也帶著這種民族主義的情感去論斷歷史，是以他很了解蔣介石在近代中國主要的成就即是呈現著民族主義的精神，並為中國解除不平等條約及領導抗日成功，蔣介石這層面的成就是超出他在民權主義、民生主義面向的成績之不足或蒼白。

而對於國民黨另一領袖蔣經國，余英時亦曾經歷不同歷史階段的評價。余英時就曾指出他對蔣經國的印象原本一直不好，不好的原因，很大是他是蔣介石的兒子，父傳子是余不能贊成的，而蔣經國最早把自由派勢力幹掉，壓迫《自由中國》雜誌他是有份的，所以早期蔣經國是民主的敵人，但後來慢慢覺悟，值得稱許⁴⁸。是以當蔣經國晚年時在台灣推動諸多民主改革，余英時則稱許蔣經國看清了世界潮流的方向，毅然以家長式的權力謀求家長統治的統治，因而奠定了民主改革的基礎⁴⁹，蔣經國可以說是 1980 年代起台灣政治改革的最重要原動力⁵⁰。是以余英時稱許蔣經國是「吾見其進，未見其止」，余英時指出，其實蔣經國他一生政治思想上有兩次的自我超越，他 16 歲到 28 歲這段時間是在蘇聯度過的，共產主義的「理想」對他有重大影響，但他也體驗到共產組織的殘酷和黑暗。因此當他 1936 年回國時，他已從共產主義轉向三民主義了。而蔣經國的第二次超越發生在晚年，全力推動民主的改革，余英時認為蔣經國不是完全向台灣社會的現實，求取妥協與現實，因為他集大權於一身，

⁴⁶ 余英時，〈知識分子與「光棍」〉，《民主與兩岸動向》，頁 136。

⁴⁷ 余英時，〈胡適是 20 世紀影響力最大也最長久的思想家〉，收錄於彭國翔編，《學思答問—余英時訪談集》，頁 191。

⁴⁸ 何榮幸，〈專訪余英時之四—本土篇〉，《Google/天下雜誌》，發行日期，2014/09/17，<http://www.cw.com.tw/article/article.action?id=5061335>（瀏覽日期：2016/11/15）。

⁴⁹ 余英時，〈世界新體系下台灣的兩大課題〉，《民主與兩岸動向》，頁 77。

⁵⁰ 余英時，〈急不得也緩不得〉，《民主與兩岸動向》，頁 2。

而從不濫用權力，也不是為客觀形勢所逼而不得不示弱，蔣經國最後對民主的堅定信仰，主要來自於具體的生活實踐，而不是抽象的理論⁵¹。而蔣經國晚年的思想進步，可以從 1960 年代之初，他似乎並沒有對《自由中國》事件流露出任何惋惜之情一事可看出⁵²。

是以余英時對蔣經國的評價由前期的惡感到他過世時連寫了多篇悼念蔣經國的文章，而給予至高的歷史評價⁵³。

四、結語

余英時曾經提及，他當年（1950 年代中期）剛到哈佛大學時，曾在費正清家中的週四茶會上，聽到費正清夫婦和其他的美國客人討論聯合國中國代表權的問題。費氏他們那一群人幾乎都是主張中共應該取代國民黨的。費夫人則笑著對余英時說：你大概不贊成吧。余英時則回答不能同意他們的說法。而費夫人繼續問余英時是因為反共而擁護國民黨嗎？余英時則說：「我是從香港來的，國民黨懷疑我是『第三勢力』，因此不肯發護照給我，以致我只得以無國籍的身分取得簽證的。你說我有什麼辦法擁護國民黨嗎？但是我確實是反共的。我覺得你們實在不瞭解中國共產黨」⁵⁴。

這段往事可以充分反映余英時政治思想的大致形貌，從 1950 年代起當他還在香港新亞書院就讀時，就已經形塑了他反共的政治思想，而終其一生的時論或歷史文論都呈現他對中共是中國近代歷史的逆流之嚴峻批判⁵⁵，而相對於他對國民黨的批評，他基本上肯定國民黨孫文思想的正面性，是要為中國尋求一民主憲政的自由之路，雖然期間國民黨訓政階段實行「一黨專政」、「黨化教育」而致逸出孫文原本的政治規劃，又由於日本對中國具有毀滅性的侵略，導致原本南京的國府所建立的現代化建設為之中斷，誠是歷史的外在客觀因素所造成的悲劇，然國民黨的幾位領導人物，從孫文、蔣介石到蔣經國誠都有其或深或淺的集權威權性格與統治事實，但他們都不是毛澤東獨夫的本質，而國民黨的三民主義基本上是開放的意識形態，會有自我修正的功能；對照於中國共產黨的馬克思主義的封閉意識形態，更是形同強烈的對比。

綜而言之，余英時終其一生，一貫是秉持著胡適自由主義為價值的人文關懷，他對國民黨諸多的違反自由主義原則的事件，他仍然是有所批評的，故多年來他也極為關心台灣民主政治的發展。如 1979 年 12 月美麗島事件爆發時，余英時就曾經投書《紐約時報》，其中曾針對美麗島事件強調，政府不應該採取強暴的手

⁵¹ 余英時，〈吾見其進，未見其止——經國先生的現實與理想〉，《中央日報》，1988 年 1 月 26 日，第 2 版。

⁵² 余英時，〈民主罪言〉，《民主與兩岸動向》，頁 44。

⁵³ 余英時對蔣經國的悼文，可參見〈「群龍無首」，民主之始——敬悼蔣經國總統〉和〈「三民主義統一中國」的深遠意義——再悼蔣經國總統〉，皆收錄於《民主與兩岸動向》，頁 10-14；15-20。

⁵⁴ 余英時，〈費正清與中國〉，《中國文化與現代變遷》，頁 153。

⁵⁵ 有關余英時對中共的批評，可以參見拙文，〈從歷史與政治的層面觀察余英時對中共的批評〉，收錄於中央警察大學通識教育中心編輯，《執法倫理與通識教育學術研討會論文集》（桃園：中央警察大學通識教育中心，2015.03），頁 77-100。

段來對待反對派。2012 年台灣反媒體壟斷運動時，余英時亦參與網路的聯署⁵⁶。此一台灣反媒體壟斷運動，係因為此事背後隱含著中共透過台商收購台灣媒體的企圖，故余英時對於當時青年學生的反對運動是極為支持的⁵⁷。從這裡可以看出余英時超越一己利害得失扮演一位學人與知識分子的典範身影！

⁵⁶ 許芳菊，〈活出知識分子的風骨－漢學獎得主余英時〉，《永不放棄－唐獎得主的故事》（台北：天下雜誌公司，2015），頁 177。

⁵⁷ 參見〈余英時致黃國昌函〉，2012 年 11 月 26 日，此函刊登於《蘋果日報》，2012 年 11 月 28 日，「要聞港聞」版。